

# 史通

〔唐〕刘知几 著  
张固也 注译

国学经典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国学经典

〔唐〕刘知几 著

# 史通

张固也 注译

中州古籍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通/(唐)刘知几著;张固也注译.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 12  
(国学经典)  
ISBN 978 - 7 - 5348 - 4011 - 1

I. ①史… II. ①刘… ②张… III. ①史学理论—中国—唐代  
②《史通》—注释 IV. ①K092.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3856 号

---

书名:史 通

SHITONG

著者:(唐)刘知几

注译者:张固也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0371 - 65723280)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河南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40mm×960mm 1/16 印张:21.5

字数:280 千字

印数:1 - 5000 册

版次: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2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 目 录

叙录	19
----	----

## 内 篇

六家第一	22
二体第二	38
载言第三	44
本纪第四	46
世家第五	50
列传第六	55
表历第七	58
书志第八	61
论赞第九	69
序例第十	72
题目第十一	76
断限第十二	80
编次第十三	82
称谓第十四	88
采撰第十五	91

载文第十六	96
补注第十七	103
因习第十八	108
邑里第十九	114
言语第二十	117
浮词第二十一	123
叙事第二十二	127
品藻第二十三	136
直书第二十四	140
曲笔第二十五	145
鉴识第二十六	152
探赜第二十七	160
模拟第二十八	165
书事第二十九	168
人物第三十	175
核才第三十一	180
序传第三十二	184
烦省第三十三	188
杂述第三十四	192
辨职第三十五	199
自叙第三十六	203

## 外 篇

史官建置第一	215
古今正史第二	227
疑古第三	251

惑经第四	270
申左第五	289
点烦第六	294
杂说上第七	296
杂说中第八	302
杂说下第九	310
汉书五行志错误第十	315
五行志杂驳第十一	319
暗惑第十二	323
忤时第十三	329

史 通





# 前 言

—

《史通》是唐代刘知几编撰的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

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他出身于累代官宦并以文词知名的世家，族祖刘胤之、伯父刘延祐都曾任著作郎及弘文馆学士，参与编撰唐国史及实录。刘知几本人自幼酷爱文史，博览群书，十七岁时已把《左传》、《史记》、《汉书》等唐前基本的史籍读完，且善于独立思考，时常有精到的心得与卓越的见解。但他这时因准备科举考试，还不能专心研究历史。刘知几在二十岁时考中了进士，被任为获嘉县（今河南获嘉）主簿。从这时起，他才对历史进行广博的阅读与深入的研究。《自叙》（凡引《史通》一律简称篇名）述及他对史学兴趣之浓厚与用功之精勤：

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于是思有余闲，遂其本愿。旅游京洛，颇积岁年，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

刘知几在获嘉县主簿任上，曾两次上书，提出四项政治改革的建议：裁撤冗官，刺史应当久任，不要轻易颁下赦令，不要对官吏

滥授阶勋。这些建议，都切中时弊，但武则天看了他的上书，却只是“嘉其直”而“不能用”（《新唐书·刘子玄传》），以致他在这个九品小官任上一连十九年没有升迁。直到武则天圣历二年（699），他才从获嘉县调到京城长安任右补阙、定王府仓曹，并参加《三教珠英》的编纂工作。

长安二年（702），武则天诏令编撰唐史，刘知几遂任著作佐郎，兼修国史。这一年他四十二岁，已经研习历史三十年，具备良好的史学修养，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一名专职的史官。此后至中宗时期，他的职务数有变迁，担任过左史、著作郎、凤阁（中书）舍人、太子中允、率更令等职，除长安末任凤阁舍人时暂停史职外，其他时间都不离史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自叙》）。这在唐代是令人羡慕的职位，而对刘知几来说，则是得到了实现成为优秀史家理想的平台。但是，现实却与他的愿望相悖。当时朝廷内部争夺倾轧，政治败坏，史馆也不是一方净土。当权大臣以监修国史的头衔颐指气使，滥竽充数的同事观望推诿，刘知几虽然身任史官，却不能按照自己的见解修撰史书，时常由于与他们的意见不合、自己的主张不能实现而深怀不满。于是他在履行史官职责，完成自己的修史任务的同时，将更多精力放在私撰《史通》上。据《自叙》说：

长安中年，会奉诏预修《唐史》。及今上（中宗）即位，又敕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凡所著述，常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沉浮。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歿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特别是在景龙元年至景龙三年（707—709），复位后的唐中宗

驾回西京长安，刘知几请求滞留东都洛阳，在这三年中得以专心致志地写作《史通》。景龙二年初，朝廷征召他到西京修史，他感叹“小人道长，纲纪日坏，仕于其间，忽忽不乐”，给监修国史萧至忠等人写信，痛陈史馆存在五大弊端，想要辞去史职，并把这封信全文写进《忤时》，编为《史通》的末篇。景龙四年，一部伟大的史学理论著作终于横空出世！这位刚刚五十而知天命的作者自负地写道：

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揆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不蒂芥者矣。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自叙》）

《史通》成书后不久，唐中宗被自己的妻女毒死，唐睿宗继位，立李隆基为太子。因“几”（幾）字与“基”字谐音，刘知几连自己名字的使用权也被放弃，改以字行。此后他相继担任过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散骑常侍等官职，仍兼修国史，与友人吴兢等先后修成《唐书》、《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睿宗实录》等，又与柳冲等改定《氏族志》。

开元九年（721），刘知几六十一岁。这年他的长子刘颢任太乐令，因犯罪被流放边城。他上诉辩理，竟触唐玄宗之怒，被贬为安州都督府别驾，不久就含恨离世。

综观刘知几的一生，可以说是抑郁不得志，但是他留下的《史通》这部史学巨著却为他树立起一座永远的丰碑。

## 二

《史通》二十卷，其中《内篇》十卷三十六篇，《外篇》十卷

十三篇，共四十九篇，与两《唐书·刘子玄传》记载相吻合。宋本《内篇》末多三篇，有目无文，是否原书篇目，难以断言。

刘知几为何采取这种全书编撰结构？这个问题对于深入认识《史通》一书的性质至关重要。

近人傅振伦先生曾经讨论《史通》与刘勰《文心雕龙》之间的关系，颇多发明。其大意以为，一方面从思想上说，“《史通》一书，即就《文心·史传》篇意推广而成”；另一方面从编撰结构上说，“其书亦全模拟之”。（《刘知几年谱》第21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关于后一点的论证，他只是比较二书部分篇名近似，既不尽妥当，也不很全面。后来有些学者做过补充论述，仍然未尽准确。其实，从编撰结构上“全模拟之”的，主要是《内篇》。

刘勰《文心雕龙》共五十篇，学界一般按照《序志》篇的说法，分为三部分：《原道》至《辨骚》五篇为“文之枢纽”，是全书的绪论及理论核心；《明诗》至《书记》二十篇为“论文叙笔”，是文体论；《神思》至《程器》二十四篇为“割情析采”，是文学创作论、批评论；加上《序志》篇凑成“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拿《内篇》来做简单比较，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前两篇《六家》、《二体》综论上古至唐初各种史书体裁，以引出下面对纪传体史书的具体讨论，也反映了作者对史书的总体看法，与《文心》前五篇地位相当。《载言》至《序例》八篇都是讨论史体的，但不是目录学意义上的纪传体、编年体之类的史体，而是组成纪传体的内部诸体，即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加上虽非一体但也属纪传史组成部分的论赞及序例，还有建议增设的载言，显然相当于《文心》的文体论。《题目》至《辨职》二十五篇讨论了史书编撰过程中经常遇见的各种问题，包括如何起书名篇题（《题目》），如何确定记事范围（《断限》），如何分类编排（《编次》），如何称呼历史人物（《称谓》），如何采编史料（《采撰》），

如何记载言词文章（《载文》），如何给史书作注（《补注》），如何避免因袭致误（《因习》），如何记载邑里（《邑里》），如何记载口头俚语（《言语》），如何穿插精妙评论（《浮词》），如何简要叙述史事（《叙事》），如何评判人物等级高下（《品藻》），如何做到直书而没有曲笔（《直书》、《曲笔》），如何看待并学习前人史书（《鉴识》、《探赜》、《模拟》），哪些历史事件和人物可以入史（《书事》、《人物》），如何看待史才（《核才》），如何写序传（《序传》），如何把握史书篇幅（《烦省》），正史以外还有哪些史料（《杂述》），史官的职责如何（《辨职》），等等，对史书编撰方法谈得面面俱到，甚至连各篇的先后顺序都相当讲究，完全可以与《文心》文学创作论、批评论相媲美。最后的《自叙》与《文心·序志》相对应，就不用多说了。所不同的是，纪传史内部诸体寥寥无几，比文体数量少得多，《内篇》无法凑出《文心》那样的五十篇。刘知几另撰《外篇》十三篇，再加书前《叙录》，全书就达到“大易之数”五十篇了，这是否也在有意模仿刘勰呢？

通过以上编撰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出，更准确地说，《史通》是一部以讨论纪传体史书的内部体例和编撰方法为中心的史学理论著作。

至此，可以对《史通》之所以出现在唐代并由刘知几来完成，谈点粗浅的认识。前贤讨论这一问题，主要以为唐初以前史书编撰成就巨大（如《隋书·经籍志》著录史书之多），零星、单篇史论极其丰富（如《文心雕龙·史传》），客观上需要有人来做一番总结性的评论工作；而刘知几博览群书，精研史学，又喜谈名理，也具备对史学进行总结的主观条件。这当然都是很有道理的，但还应该进一步指出，唐初正史观念的变化和史馆制度的确立对于《史通》的创作具有更直接的影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刘知几是把“六家”、“二体”都看作“古今正史”的，但作为唐初史家，他显

然已经把纪传体视作唯一的正史，这正是他以纪传体内部体例和编撰方法为中心展开讨论的根本原因。唐初最终确立了史馆制度，国史编撰被垄断，而要集体分工合作完成修史任务，史书体例和编撰方法的讨论益显其重要。尽管刘知几极言史馆之弊及其本人如何与监修、史官们意见不合，但他“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的经历和与同事们的争论，无疑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史学阅历，深化了他的史学见解。同时，史馆制度不允许另起炉灶私撰国史，他也只能聊抒议论，否则他很可能会像前人那样，在自撰史书前写篇史例略作交代而已。他在《叙录》中自述创作动机是“职司其忧”（又见《史官建置》），又说书名是模仿汉人在白虎阁讨论经义而成《白虎通》，“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这不已明示其为史馆的职务之作了吗！不过，在当时监修国史的权贵大臣眼中，刘知几这是替领导操心的越位之举，所谓“获罪于时，固其宜矣”。

### 三

近代以来，旧式纪传体早已退出历史舞台，新式史书体例和史学理论层出不穷，《史通》既然只是一部以讨论纪传体内部体例和编撰方法为中心的史学理论著作，是否就不再适应时代的需要了呢？绝非如此！因为史书编撰形式可以变化，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体裁的史书所遵循的史学原则，所蕴含的理论因子却是可以相通和借鉴的。刘知几这部光辉的史学理论著作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唐前史学发展的历史，提出了史书编撰的义例，特别是总结和发扬了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提出了许多史学理论和主张。这些史学论述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崇高地位，发挥了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至今仍闪耀着理论光芒。

首先，《史通》第一次对中国史学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总结。刘知几总结先秦以来史官制度和史书编撰的发展，并加以理论思

考，创造性地将“正史”流派高度概括为“六家”、“二体”，又把“偏记、小说”分为十类，对各体各类史书的源流特征、长短得失一一作出评述。这些论述涉及许多重要的理论课题，如他引经入史，把《尚书》、《春秋》、《左传》纳入史书范畴，对于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说”产生深远影响。他在总结中善于进行归纳比较，如记言和记事、纪传和编年、通史和断代、官修史书和私撰杂史、古史和近代史书等相互之间的异同关系，分析精到，引人入胜。

其次，《史通》提出了一整套史学批评的原则和理论。刘知几认为，史学批评要打破门户之见，“精于《公羊》者，尤憎《左氏》；习于太史者，偏嫉孟坚。夫能以彼所长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攻彼之非，兼善者鲜矣”（《杂说下》）。门户之见不打破就不能克服史学批评的片面性。史学批评切忌穿凿，“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之耳目”（《探赜》）。刘知几还提出一些重要的批评理论和标准，如“质文递变”（《六家》）、“适俗随时”（《杂说中》）的史学发展观，“彰善贬恶”（《辨职》）的史学价值观，“文之将史，其流一焉”（《载文》）的文史观，“史无例，则是非莫准”（《序例》）的体例观，“文约而事丰”（《叙事》）、“事简而意深”（《言语》）的记事标准等。这些对于任何时代、任何体裁的史学批评都是适用的，甚至对于一般的学术研究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第三，《史通》提倡实事求是的史学精神，表彰“直书”，贬斥“曲笔”。刘知几在《直书》、《曲笔》等篇中特别强调这一精神，赞赏史家“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仗气直书，不避强御”的浩然正气，主张“以实录直书为贵”、“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惑经》）。对过去史书中那些阿时媚势，诬善讳恶的曲笔，痛加斥责。这一基本精神贯穿全书，“善恶必书”、“不掩恶，不虚美”，不能“饰非文过”、“曲笔诬书”

等说法俯拾即是。特别是“实”字使用了一百七十多次，仅在“求实”意义上使用“实录”一词就不下三十处，以至于有学者将刘知几的史学概括为“实录史学”。“直书”、“实录”固然是中国史学肇始之初就被提倡的，但刘知几大声疾呼、身体力行，在继承诠释、发扬光大这一中国史学优良传统方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直到今天，仍然是史学工作者所要注意的问题。

第四，《史通》批判了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圣人的观念，具有进化的历史观。《疑古》篇对《尚书》提出了十条怀疑，认为舜继尧、禹继舜等都不是如史书所说的禅让。《惑经》篇列举《春秋》十二处讲不通的地方，五处虚美的地方，指出孟子、司马迁、班固推崇孔子有“虚美”之处。他指责二书对历史的讳饰，对孔夫子不实事求是的写作态度颇不满意。他说：“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国家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奚独多乎？”（《惑经》）《书志》、《汉书五行志错误》等篇对汉代董仲舒、班固等人的庸俗神意史观进行批判。这些都集中体现了刘知几不盲目崇拜古代、不迷信圣人和经典的批判精神和卓越的史学见解。

最后，《史通》全面阐述了著名的“史才三长”理论。《旧唐书·刘子玄传》记载，礼部尚书郑惟忠问刘知几为什么自古以来文士多史家少，刘知几回答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这段话对史家须具备的自身条件讲得比较全面。《史通》中虽然没有如此完整的表述，但在其史学评论中处处都贯彻了这样的精神，而且就才、学、识分别进行了极为周详的阐述。刘知几谈论史才，主要是组织史料和文字表达的能力，《载文》、《言语》、《浮词》、《叙事》、《品藻》、《核才》等篇，都在比较集中地讨论这些问题。他谈论史学，是指史家的知识学问以及取得知识学问的能力和途径，也就是掌握和鉴别史料的



问题。他主张“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杂述》），并能“详其是非”，“练其得失，明其真伪”（《采撰》）。他谈论史识，主要指史家对历史和史书的见解和观点，以及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品质和献身精神。三者当中，他特别强调史识，说：“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鉴识》）后来章学诚在“三长”基础上，更明确地提出“史德”的概念，实际上也是从刘氏所论“史识”中分立出来的。直到今天，适应时代需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才、学、识，仍然是对史学工作者和其他从事学术研究者的基本要求。

#### 四

《史通》成书后，立即在学界产生巨大影响。开元年间吴兢编撰其家藏书目，特地增设“文史”类目，最能说明这一问题。但也有不少人斥其“工诃古人”。唐末柳璨的《史通析微》、宋代孙何的《驳史通》都是专门为批驳刘知几而作。所以，尽管南宋时《史通》已有刻本，但流传并不很广泛。

明代中叶以后，《史通》才又逐渐受到学者重视。今存最早的《史通》版本，是明嘉靖十四年（1535）的陆深刻本。陆氏所据为不知刻于何时的蜀刻本，又没有别本可供比勘，讹脱较多。他又采自以为精粹者，编为《史通会要》三卷，收入《俨山外集》中，亦颇鲁莽割裂。其后万历五年（1577）张之象据无锡秦柱家藏的宋版校刻，较陆深本精善。又有万历三十年（1602）张鼎思刻本，曾经影印在《四部丛刊》中，此本据家藏抄本作过校补，但第五卷中《补注》、《因习》两篇，仍有大段脱误（后来郭孔延刻《史通评释》，即据张之象本补刻了这两篇的全文）。至于就书中文义加以评释的，明代主要有李维桢、郭孔延的《史通评释》，陈继儒的《史通订注》，王惟俭的《史通训故》三家。清代整理研究《史通》的